# 西行路上说小妖

陈大康

易被人忽略的小妖在《西游记》中数量最为庞大，狮、象、鹏三怪手下就“共计算有四万七八千”，狮驼城中小妖汇成的恶气冲天，悟空见了也“吓了一跌，挣挫不起”。狮、象是文殊、普贤的坐骑，大鹏与如来有点亲谊，他们三人出马足以收伏三怪，但如来的阵容却是“面前五百阿罗汉，脑后三千揭谛神”，似是要在气势上压倒那四万七八千小妖。孙悟空在花果山称王时，属下“计有四万七千余口”。那些小妖或随班操备，或随节征粮，“把一座花果山造得似铁桶金城”。后来悟空被唐僧赶回花果山时就关心地问：“我当时共有四万七千群妖，如今都往那里去了？”他还率领“本洞小妖”，将千余猎户“一个个石打乌头粉碎”，尸首“都推在那万丈深潭里”，那些猴子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小妖。

多数妖怪身边的小妖却少得多。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比较寒酸，巡山只是“点起三十名小怪”，家底总共“不过有四五百兵”，与悟空对阵时也只能“点起大小群妖，有三百多名”。黄风怪手下稍多些，“除了大小头目，还有五七百名小校”，积雷山的玉面公主为助牛魔王作战倾洞而出，“前后点起七长八短，有百十余口”，压龙山狐怪手下也只有“妖兵二百余名”。黄眉怪算是神气的，“有四五千大小妖，一个个威强力胜”。七绝山的蟒精最可怜，它修炼尚未到家，还不会开口言语，身边一个小妖都没有。作者似是综合考虑妖怪的性情、法力与势力范围大小等因素，给它安排小妖的数量。

有小妖供使唤，妖怪就省心多了。对外守洞巡山、坐夜打梆，乃至抓住唐僧绳缠索绑都是小妖的活。作品中常有类似的场景：悟空为救唐僧打破洞门，守门小妖就赶紧禀报：“祸事了！”若是实力较弱的八戒或沙僧，则禀报说“买卖来了”，接着便给妖怪送上批挂兵器。至于对内，洞府的整洁、烧火递茶与酒宴服务什么的，也全都由小妖操办，妖怪安寝，也有几个抹粉搽胭的山精树鬼展铺盖伏侍，“脱脚的脱脚，解衣的解衣”。小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烧火的只管烧火，巡山的只管巡山”，有它们左右环绕，妖怪的生活算是有个模样了。

妖怪与对手厮打时，身后一众小妖就摇旗呐喊，壮其声威。狮、象、鹏三怪与悟空对阵，“前前后后，有三万多精，都执着精锐器械，出洞摆开一个三才阵势”；金角大王与悟空对阵时，身边小妖虽只有三百多名，但“一个个拈枪弄棒，理索轮刀”，杀气腾腾的氛围环绕了对手。红孩儿身边小妖较少，但它们干的是技术活，与悟空交战前，只有十个小妖“推出五辆小车儿来”，然后“将车子按金、木、水、火、土安下”。红孩儿打不过悟空，那五辆小车就涌出红焰焰的大火，“烟火迷漫，真个是熯天炽地”，悟空只得败退，八戒逃得更快，“把老猪弄做个烧熟的，加上香料，尽他受用哩！”

小妖不多，但洞府中各种活得有人干，那红孩儿自有办法。悟空刚到号山就听到哭诉：“常常的把我们山神土地拿了去，烧火顶门，黑夜与他提铃喝号”。那批山神土地“都披一片，挂一片，裩无裆，裤无口的”，全无神祇庄严相，而原因则是“小妖儿又讨甚么常例钱”，个个凶神恶煞，有的“有一丈二尺的身子”，山神土地哪里是它们的对手，“只得捉几个山獐野鹿，早晚间打点群精”，“若是没物相送，就要来拆庙宇，剥衣裳”。山神土地好歹也是天上派驻人间的官员，可是却被小妖们整得“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小妖讨得“常例钱”也不是全归自己享用，悟空变成“总钻风”混入小妖队伍，开口就要那些小钻风每人交五两银子的“见面钱”，以上欺下是小妖队伍中的常态，而小钻风见来了新上司，“即忙唱喏”巴结，主动带他去找同伴可多收点“见面钱”。

小钻风不怀疑悟空自称总钻风，是因为妖怪确实提拔一些小妖为协管。狮驼山那儿就“列着有百十大小头目，一个个全装披挂，介胄整齐，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能排出这么多，是因为小妖基数的庞大。有的妖怪手下总共百十个小妖，选拔的头目也只有个把，此时其地位与作用就更为重要，西行途中有两个妖怪就是受头目怂恿才捉拿了唐僧。黄风岭的虎先锋擅自捉拿唐僧，黄风怪惊张道：“我教你去巡山，只该拿些山牛、野彘、肥鹿、胡羊，怎么拿那唐僧来？”先锋只顾表功，还力主立即食用：“大王，见食不食，呼为劣蹶。”黄风怪则以“与你拜为兄弟”为激励，要它将悟空也抓来。类似的景象还发生在通天河，灵感大王因败于悟空，不敢且无捉拿唐僧之策，这时鳜鱼精献上了冻河融冰之计，灵感大王大喜，允诺“捉了唐僧，与你拜为兄妹，共席享之”。

有的小妖对捉拿唐僧也很起劲，甚至想以此为晋升之途。隐雾山的豹子精连八戒都打不过，眼见捉拿唐僧无望，只得在洞中“默默无言”呆坐。手下的狼怪献上了“分瓣梅花计”，豹子精依计行事，果然成功，当即提拔它为先锋，其他小妖也欢呼雀跃，纷纷建言献策。有的提议将唐僧“碎剁碎剁，把些大料煎了，香喷喷的大家吃一块儿”，有的认为“还是蒸了吃的有味”，有的主张“煮了吃，还省柴”，有的则想吃咸肉，“着些盐儿腌腌，吃得长久”。不过等悟空打进洞来，那些小妖又“一个个魂飞魄散，都报怨先锋的不是”。还有那银角大王，本来畏惧悟空的神通有点怯场，但遭到了小妖的批评：“大王，怎么长他人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你夸谁哩？”小妖们还表示，大家“合力齐心，怕他走了那里去”。

小妖想吃唐僧肉，但对能否挨得上却是心存疑虑。在狮驼岭，悟空化身小钻风，吓唬洞前小妖，说看到孙悟空在山涧里磨杠，“磨得明了，先打死你门前一万精”，唬得小妖们“一个个心惊胆战，魂散魄飞”，然后悟空乘机做起了思想工作：“那唐僧的肉也不多几斤，也分不到我处，我们替他顶这个缸怎的！不如我们各自散一散罢。”众妖深以为然，一万小妖“鸣的一声都哄然而去了”。不过也有妖怪明言让小妖分享，狮怪就宣布：“各散一块儿与小的们吃，也教他个个长生”；另一个青牛怪也告诉小妖，待杀了唐僧，“大家散福受用”。摆出有福同享的姿态，是要它们有难同当。那些小妖果然也肯奋勇争先，麒麟山上小妖摆开阵势，“森森罗列执干戈，映日光明；密密挨排展旌旗，迎风飘闪”，以至于“行者见了，不敢前进”；平顶山上那一战，小妖们“越打越上，一似绵絮缠身，搂腰扯腿，莫肯退后”，弄得悟空也没奈何。

鲁迅曾称《西游记》“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对小妖的描写即是如此。悟空用绳系住狮怪的心肝，恶斗时便猛抽绳儿。作者此时不忙着写痛苦不堪的狮怪，而是着笔于助战的小妖：“众小妖远远看见，齐声高叫道：‘大王，莫惹他！让他去罢！这猴儿不按时景，清明还未到，他却那里放风筝也！’”又如在平顶山，金角大王正与悟空斗得不可开交，冷不防听到被悟空分身打得星落云散的小妖齐声喊道：“大王啊，事不谐矣！难矣乎哉！满地盈山皆是孙行者了！”小妖的插科打诨，顿时将你死我活的激战变成了供读者欣赏的游戏。

《西游记》改编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作，那些作品里虽也有白虎精、馗头鼍龙等妖怪，但都是单打独斗，并无小妖相助，《西游记》中的那许多小妖纯是改编时才现身纸上。其中有些在情节进展时起了重要作用，悟空哄骗平顶山的精细鬼与伶俐虫一节，作者竟洋洋洒洒地写了四千余字，围绕狮驼山的小钻风也写了近三千字，关于豹头山的刁钻古怪与古怪刁钻、碧波潭的奔波儿灞与灞波儿奔，以及麒麟山的有来有去，也都有相当篇幅的描写。西行路上的小妖屡屡现身，或奸诈，或呆傻，或凶神恶煞，或阿谀献媚，其言行易使读者联想到当时社会上胥吏、家丁、马仔、破落户一类人物，作者并非凭空写来，小妖世界其实同样也是人世间影像的折射。

小 楼
（水粉画）
马昭君

# 艾略特与我

裘小龙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在《文学评论》杂志中，我第一次读到艾略特的名字。当时，我是个“黑崽子”，躲在窗帘后，胆战心惊地读着关于这样一位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文字；窗外，延伸着发高烧似的黯红天际，敲锣打鼓的欢庆声、批判声直冲云霄。那些日子里，中国读者无法读到他的任何诗作。那篇评论中引用的艾略特诗行，因此让我大吃一惊。我的小学、中学课本都是讲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一本名为《红旗歌谣》的诗集不知读了多少遍。我不禁纳闷，外面的读者读艾略特诗歌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在围绕着我的“长城”中似乎出现了缝隙，露出了一抹惨白的天空，“像病人上了乙醚，躺在手术台上”。

1976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硕士研究生。当时必修的课本中仍有一本是苏联学者编纂的英美文学史，其中关于艾略特的论述颇像来自那本《文学评论》的回声。幸运的是，我导师卞之琳先生自己在三十年代也译过艾略特，同意了我的硕士论文题目：“艾略特早期诗中的个人化与非个人化”。作为论文的附录，我同时开始翻他的诗，接着又扩展成一本诗歌翻译集子，《四个四重奏》，由漓江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收入了他全部的重要诗篇。

这本翻译诗集却意外地成了畅销书，初版后很快重印了五六次。我十分惊讶地读到，一对年轻的恋人特意做出安排，给装在黄鱼车中的嫁妆上放了本《四个四重奏》，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中招摇过市。这样做据说是时髦的、是现代主义的。不过，《四个四重奏》一夜间走红，首先是因为开放初始，中国读者对先前未曾接触到的现代主义作品产生了强烈兴趣，同时也多少有一些的阴错阳差的因素在内，让人想到他在“南希表妹”中写到的现代性与时髦性混杂，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

且不提艾略特对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的影响，人们对此已做了不少研究。对八十年代一些青年诗人来说，艾略特的诗也帮助了他们，在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浪潮中，找到自己不同于先前诗歌的表达方式和感性——朦胧诗的标签或许过于简单，只能说是约定俗成吧。有意思的是，早在《玄学派诗人》一文中，艾略特就这样论述到：“当诗人头脑为工作完美地配备齐全了，它就在不停地把不同的经验在诗中汇合起来……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诗人因此只能是晦涩、难懂的。”朦胧诗在中国的出现不难理解，尽管用艾略特的标准来看，这些“远方”诗人的朦胧还远远不够。

对我来说，那篇硕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的学习、思考，让我看到了诗学的新地平线。在国内那一时期的诗歌写作、诗歌理论中，“个人化”一词是贬义的，几乎都不能提，“非个人化”于是也根本无从谈起。在艾略特的诗歌批评理论中，个人化与非个人化其实并不构成矛盾，相反，这构成了现代主义诗歌的一种张力。把生活中的人与创造中的头脑分离开来，让个人化的经验转化成非个人化的，这样，诗就能对所有的读者说话，使他们在诗的意境中发现共同的、普世性的意义和感受。

1988年，我获福特基金奖，选在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作一年的访问研究。这是艾略特出生的城市，也是他祖父创建的大学，我计划在那里做研究、收集资料，准备回国后写本艾略特的批评传记。然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许多意想不到的因素凑在一起，我就只能留在这个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接着开始用英文创作小说了。

所谓一啄一饮，我陈探长系列小说中的主人公，成了正直却又带书生气的警官，为伸张自己心目中的公平正义，跌跌撞撞地坚持前行；在一个又一个案件中，他经常引用艾略特的诗行，这让他的探案工作增添了复杂的人性、感性视角。（顺提一句，“荒原”的原名是“他用不同的声音出演警察”；艾略特本人也说过，他特别喜欢法国作家乔治·西蒙农的麦格雷探长小说。）陈探长系列中第四本小说的案情，让他感受到个人化却又具存在主义感觉的“恶心”，他于是模仿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戏剧性内心独白写了一首诗。“……我的领结紧紧固定，/我的鳄鱼皮鞋铮铮闪亮。/（可他们会想，‘他肤色多黄！’）我引用莎士比亚、马弗尔、多恩，/ 他们会有什么样反应？/ 一句话，我说不准。/（但他们私下说，‘他口音多重！’）……”在这系列的第十四本小说中，陈被解除了探长职务，却依旧不肯放弃自己继续探案的努力；他于是动笔写一本有关鱼玄机谋杀案的狄公案小说——作为他私底下继续工作的掩护。还多少有点像艾略特在“燃烧的诺顿”中所写的那样，“就像一只静止的中国花瓶 / 始终在静止中运动。”与此同时，把中国古代的与现代的探案叠加在一起，恰恰也是在艾略特的影响下，把过去与现在并置、对照，从而促成诗境界的多维度呈现。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有机会在世界各地参加文学节与书刊宣传、签售活动，与讲着各种不同语言的读者们进行交流。其中时常会问起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艾略特对陈探长，也对今天全球的读者来说，仍是那么重要？”

一个法国读者带着香槟酒，还有英法双语版的艾略特诗集，在圣马洛文学节临时搭起的帐篷里，用两种语言抑扬顿挫地念着诗行，探讨在诗与译诗中融合起不同语言感性的可能性。挪威的出版社的主编，与我反复琢磨，艾略特诗歌的内在音乐性怎样让歌舞剧《猫》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也为我拍桌叹息，那买下艾略特圣路易斯故居的机会，竟然与我擦肩而过）。一位荷兰的导演（Chris Teerink），去年年中飞来圣路易斯，为他拍摄中的艾略特纪录片采访我。他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翻译处理“荒原”中频繁的互文性用典？作为一种解释，我提到了中国古典诗词互文性用典其实用得更多，有时甚至是一行一典故。在诗歌翻译中，正是要考虑到目标语言文本的读者接受、理解的审美过程，通过不同语言的感性融合，让译诗读起来也是诗。对艾略特在作品中融合了不同语言诗歌中的感性，有时甚至是直接把另外语言嵌入诗中，荷兰导演也十分赞同，要在摄制过程中展示这点，并继续一起探讨下去。

关于艾略特诗歌的意义，读者与批评者自然会从不同角度作出自己的解答，但艾略特的“荒原”，许多人却是至今都未能从中走出。“这里没水只有岩石/岩石，没有水，只有一条沙路/在群山中蜿蜒而上……”就我自己而言，艾略特在诺贝尔奖授奖宴会作的答词，对我的写作、翻译、研究，始终带来不可或缺的启示。

“当语言构成障碍，诗歌本身就给了我们理由，要怎样努力去克服这一障碍。欣赏、阅读属于另外一种语言的诗，意味着怎样欣赏、理解那些讲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程。我们不可能由其他的途径获得这种理解‘欧洲的诗歌’一词是有意义的，全世界的‘诗歌’也同样如此。”

或许，这篇短文读上去不太像是艾略特专家们长篇累牍地写的，可至少是一篇证词：从一个自己译诗也写诗的作者的角度——在艾略特的影响下，最初用中文，然后用英文译写——证实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艾略特。他诗歌的意义不仅仅对中国读者，更对世界各地的读者都依然存在、甚至更有迫切感。

（2022年赶上艾略特创作发表“荒原”的一百周年，多个国家都安排了各种纪念活动。我的朋友凯伦，要出版一本收藏版的《艾略特诗选》，希望我作为一个华裔译者/学者，从艾略特对中国读者、全球读者的影响这个角度谈一谈。这是我不能推却的，只能勉力为之。在把这篇短文译成中文时，又作了一些改动、甚至改写。）

# 三伯，我家最神秘的亲戚

李志茗

去年12月6日上午10点多，我接到父亲电话，他说：“你三伯走了，你要打电话给堂姐家，吊唁一下。”我有些不相信，脱口而出：“您怎么知道的？”因为87岁高龄的三伯住郑州市堂姐家，而老爸在福建仙游老家，怎么知道三伯去世的事？他说是我弟弟告诉他的。我赶紧打电话给堂姐，才知道三伯是前一天下午因肺炎严重引起呼吸衰竭而去世的……

我爷爷奶奶共生育十一个子女，四女七男，1935年出生的三伯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他1954年考上大学后，就一直在北方学习和工作，至1982年才第一次回家探亲，时隔28年，真正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因此，他在我眼里一直是个神秘的存在。

从我记事起，奶奶就经常在我面前念叨三伯什么时候才能回家，言语里既有思念，也有嗔怪，听得出来奶奶对三伯较宠爱。据奶奶讲，三伯小时候很调皮，但会读书，是学霸，中小学多次跳级，得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运动来临前顺利考入大学，而他的弟弟们则没有那么幸运，因身份问题，未能步入大学校门。三伯不仅学习好，还早恋，在高中时就谈恋爱，对象是他同班女同学，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学习，双双考上大学，一个天津大学，一个厦门大学，并结为终身伴侣。对此，奶奶很得意，无须像对其他儿子一样，要为他们的婚事发愁……

奶奶不时地反复讲述，三伯的形象便深深地刻在我小小的脑子里：他是个聪明伶俐、善于学习、不需要父母操心的孩子。但三伯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工作，奶奶则讲不清，因此，我从小就对三伯很好奇：他长什么样子，长年在外地怎么生活的，不想家吗？

1982年暑假，我小学刚毕业，奶奶望眼欲穿的三伯终于举家回乡探亲。这是我们家族的一件大事，奶奶很兴奋，事先通知散居省内各地的其他子女拖家带口回来团聚。那个盛大的场面我现在没有多少印象，只记得三伯带相机回来，拍了很多照片，其中有不少是我们小孩的。我们当时在农村，没怎么拍过照片，还是很惊奇的。三伯很不容易回来一趟，轮不到我跟他交谈。我记得近距离的一次，是他问我村里哪里可以上厕所。他个子中等，长相清隽儒雅，文质彬彬，完全看不出有过淘气的样子。我觉得六叔与他长得相像，他俩的气质胜过其他兄弟。不知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至今还是没有改变，但母亲等却说三伯与六叔长得并不像，可能是刻板印象造成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三伯。因为老家住宿、卫生条件不好，三伯后来只又回来一次，那次我正上大学，没见着他。不过我在学习和工作期间，先后与他见面三次，大概是我们小辈中与他接触次数较多的人之一吧。

1991年大三时，系里组织我们年级社会考察，有北京和洛阳、西安两条线路，因为三伯在洛阳，我选择了后者。到洛阳后，趁自由活动时我去了趟伯父家，他和堂姐夫妇都上班，伯母和小外孙在看图画书，我要走时，他有些舍不得，对我说会想我的，让我非常感动，心想城市里的小孩就是不一样，小小年纪就有礼貌，很暖心。

1996年暑假，三伯到武汉钢铁厂出差，当时我刚在华中师大工作一年，他特地到我宿舍看我，见我家徒四壁，非常简陋，也没有电器，就给了我一些钱，让我去买个收音机听听，增加娱乐活动；又指着我所睡的学校配置的棕床说，这床高低不平，长期这么睡会影响脊椎的，赶紧去换一个。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三伯不是一个只会搞研究的书呆子，他很细心，也很会生活。

第四次见三伯是第二年暑假，我自己带华中师大历史系本科生社会考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庐山、红安，另一条是洛阳、西安。我选择后者，并抽空去伯父家一趟。因为白天有事，我傍晚过去，他和伯母已吃过晚饭，请我在家附近的小饭馆吃饭。

我跟三伯见了四次面，时间都很短暂，连最近的一次都已经有20多年了，因此聊些什么都忘了，但肯定只是家常话。因为他温润如玉，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我虽然与他不熟，但并不怵他。在我眼里，他就是慈祥、亲切的伯父而已，不是什么大科学家，每次与他见面，我都没什么拘束。那时我还很年轻，胸无大志，明明知道三伯很有学术造诣，但从没有向他讨教治学之道，而他也不好为人师，对我指手画脚，更不在我面前谈他事业上的成就。可他会向自己的兄弟透露，我是陆陆续续从大伯、父亲那里听到他会多种外语、当选河南省人大代表、去国外讲学以及评上教授等零星信息。他让兄弟们自豪的另一件事是他与我曾祖父李霞同时被列入仙游地方志的现代名人录里。这本仙游地方志名为“仙游古今”，1986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父亲曾特地找来一本给我看，上面是这么写三伯的：

李再耕，男，冶金部洛阳耐火材料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一九五六年秋在天津大学化工系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北京，在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院工作。一九六六年随钢铁研究院耐火材料研究室迁到河南。李再耕三十年来一直从事耐火材料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其中有“连续渡锭中间盛钢桅用镁铬质涂料的研制”“钢纤维增强耐火浇注料的研制”“高硅铝酸钙水泥的研究”“喷射冶金用整体喷枪的研制”等，曾分别获得国家科委颁发的发明奖、冶金工业部、河南省颁发的重大科技成果奖。……此外，他还先后在《钢铁》《耐火材料》等杂志上发表过二十多篇论文，并在《国外耐火材料》《国外轻金属》等杂志上发表过不少译文和综合性文章。

我想这应该是三伯提供的，可能也是他自己写的，业绩不凡，贡献卓著。但我们促膝而谈时他从不向我夸耀，我亦未主动恭维，我们不谈各自专业，就是普通伯侄之间的日常对话。三伯喜静，我也不愿多打扰他，跟他的往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式的，并不密切。除了上述几次见面外，大概也有过几次通信和电话联系，但都是琐事。其中一次，他听说我留上海工作，很是高兴，说他的几个侄儿在北京、上海、福州、厦门等地工作，很多大城市有亲戚，他去这些地方不愁没人接待。又说他在华东理工大学任兼职教授，有机会去上海，届时跟我联系云云。

我在华东师大读研究生时，堂姐夫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参加国家留学基金委的留学培训，紧张的学习之余，他找我出去玩一次，见我穿得寒酸，特地给我买了一件夹克衫。这件衣服很合身，我穿了很多年。堂姐夫还对我说“你三伯很有钱，可以找他要”。我不知他的话是玩笑还是认真，但从未动过这个念头。在我们老家，有公职叫“吃工作”，就是有钱人。三伯和二伯都很孝顺，工作后每个月都会寄钱给奶奶，奶奶是我们村里唯一每个月至少有两张汇款单的老人。她也认为三伯有钱，有时会跟我抱怨三伯等儿子不拿钱回来盖房子。村里别人盖新房，奶奶的儿子们基本“吃工作”，却没能盖新房，她觉得很没面子。

在三伯工作的年代，酒香不怕巷子深，不流行出镜率和刷存在感，我没有看到有关三伯的宣传和自我宣传，也从未去了解，我对他的认知一直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仙游古今》的层面。三伯去世后，据堂姐说，引起他那个行业的震动，一天之内就收到来自国内外的挽联上百副。12月7日追悼会当天，尽管新冠疫情在国内多地散发，但做好防护、坚持前来送行的有七八十人，单位、同事和朋友对他好评有加……堂姐在追悼会致词中说：“我心中的父亲，是一个有衣着品位，每天一杯咖啡，喜欢听音乐、品美食，一生订阅《参考消息》的人。”这也是我不知道的三伯日常生活的另一面，验证了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他是非常传统的知识分子，勤勉踏实，内外兼修，知行合一。